

進入 政治學的園地

呂亞力

要想在數千字的一篇短文內，敘述政治學各方面的發展，並且附帶討論我國政治學教學的現況，真是一樁不易的事。筆者不敢自不量力，故本文對政治學發展，只提出幾個重點，這些重點的選擇，是完全主觀的；而對我國政治學界的現況的討論，也是相當偏頗的。本文共分兩個部份：（一）政治學的發展：此部份將敘述傳統的政治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批判與政治學界的現況；（二）我國政治學的現況：此部份主要討論我國政治學界教學與研究的情形，並表示一己的觀感。

壹、政治學的發展

傳統的政治學，探討的主要對象是政治的結構（structure），其分析的形式是靜態的，其研究的基本程序為文件的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由於傳統政治學追求的目標是多重的（學術的與非學術的都有），而其對非學術的目標（促進政治革新、鼓吹種種主張、公民教育……等）往往非常重視。其著作文字中價值命題與事實命題並不加以劃分。又因為傳統政治學不致力於建立通則與理論，其對研究方法論的要求並不嚴格，任何學者均可依自己的那套方法去從事研究，有時對事實的片面描寫與一己的觀感混合成篇就構成「研究」。

傳統政治學的淵源，大約可分為三類：（一）十九世紀以前政治思想家的若干看法：政治思想家關心的主題為政治的理想與價值，亦即政治哲學的問題，不是政治的現象與事實，即我們一般所謂的政治學的考慮，但其在探究理想與價值的餘裕，也涉及現象與事實的描敘與分析，當然，除少數例外（如

亞里斯多德，曾相當有系統地觀察希臘的一百多個城邦的制度，並作成一個分類系統，其描敘與分析都缺乏嚴謹的架構與客觀的態度，但由於這些人天生的睿智與人生閱歷的豐富，他們的若干對政治現象的看法是很有價值的。茲舉數例：①亞里斯多德曾指出中等財富的人是政治穩定的維繫者。他觀察希臘城邦，發現凡是經濟兩極化（即富有者構成一集團，赤貧者構成另一集團，而居中者甚少）的皆政治動蕩不安。這一觀點，在今天還值得重視，「『中產階級』為維持政治穩定的中流砥柱」此一命題雖還未充份獲得證實，但近二十餘年來的研究，似乎已指出其可信性是相當大的。②馬基維利（Machiavelli）對政治領導的若干觀點都值得重視，特別是他指出的兩種領導類型。一種是似狐的領導者，另一種是似獅的領導者。這兩種性格的適當配合，才構成真正有效的政治領導。此一看法，對日後的精英與領導的研究，頗具啟發性，在今天還是大家很重視的。

古代（泛指十九世紀以前）的政治思想家中，對傳統政治學發展最有影響力的人，在西方計有亞里斯多德、馬基維利、霍布斯（Thomas Hobbes）、孟德斯鳩（Montesquieu）、布丹（Jean Bodin）等人；中國的先秦諸子。尤其法家的若干觀念，對本國及東亞地區知識份子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他們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治學者的作用，則很難探測。(一)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德國的國家學（*Stoaswissenschaft*）·國家學探討的焦點為法律意義的「國家」（*state*）（以別於民族意義的國家 *nation* 與土地意義的 *country*），尤其是主權的涵義及作用。此外，也研究公法（視為國家意志與主權權力的體現）的政治層面。國家學為民族主義的產物，也反映德國唯心主義的思想傳統。對今日的政治學來說（不論是所謂傳統政治學，或行為政治學），國家學的影響已在迅速消退之中。但是，若干政治學者熱衷於以純主觀的態度探索抽象的「國家本質」、「權力本體」等問題，說明國家學的影響仍然存在。(二)法理學、神學、倫理學與歷史學：事實上，直至二十世紀初葉，政治學還未充份獨立，在歐美少數講授政治課程的大學中，政治課程都是由歷史系、或哲學系提供的，早年研究政治

問題的學者，基本上都是歷史學家或哲學家……之流。無論從研究方法或探討的題材方面看，早期的政治學著作與那些較老的學科並無基本的區別。

政治學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始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大學中，有系統講授政治學是在一八八〇年左右。一八八〇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設立政治學院（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是政治學科發展的里程碑。傳統政治學的主要題材爲（一）政府制度；（二）與制度有關的法規；（三）制度的歷史；（四）意識型態，如共產主義、費邊社會主義等的原則，與「教條」的剖析與評估。早期的重要學者（其著作在今天仍值得注意的）計有 Walter Bagehot (*English Constitution, Physics and Politics*)，James Bryce (*American Commonwealth*)，Graham Walla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Charles A. 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Frank J. Goodnow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oodrow Wilson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稍後的則有 Harold Laski，Carl J. Friedrich，Hans Mongenthan，Herman Finer，G. F. G. Catlin……等。今天傳統政治學雖經歷過行爲主義者的嚴酷批判，其勢力依然很可觀，當代政治學界許多傑出的學者，是以傳統的方式作研究的。

我國政治學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傳統派的勢力。政治學界知名之士如王世杰、周鯨生、錢端升、張佛泉、蕭公權、薩孟武等無一不是傳統派政治學者。

行爲政治學，探討的主要對象是政治的過程（process），其分析的模式是動態的。研究的程序與主要的行爲科學如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等並無不同，最重要的是調查（survey）。不論是問卷調查、抑或訪談，其用意都是直接獲取資料。行爲政治學的興起，一方面是由於不少政治學者冀望仿效行爲主義的心理學家、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使其學科科學化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基於他們

對傳統政治學的不滿。他們抨擊傳統政治學的理由很多，主要的有三次：(一)傳統政治學缺乏一套嚴謹的通用的研究方法。無論是概念的採用、分析的步驟、資料的處理均無定規，完全因人而異；因此各人的成果無從有系統地比較與評估，魚目與珠無法區別。研究的結果不能真正累積，學科也就不可能真正地進步。(二)傳統政治學把研究重心放在法規與制度上，殊不知這些事物對人的行動的規範性可能相當不同。譬如，表面上看，美國的憲法與不少拉丁美洲國家的憲法都是大同小異的，但前者的條款對政治行動者的約束性就要比後者大得多；英國的政制與泰國的政制相當接近，但英國的權力中心是下議院與內閣，泰國的權力中心是高級軍官集團。由於法規與制度的規範性不是可從字面獲知的，故一種把重心放在分析字面的法規、與制度的政治學，不足以使吾人了解政治，其理至為明顯。(三)傳統政治學派的著作中，描述事實的命題與表示作者一己價值（甚或偏見）的命題常常不加區別，這種習慣加上傳統政治學者的實用傾向，常使其易介入實際政治上的派系之爭，其學術著作可能成為這類爭執的武器，其客觀性大成問題，所描述的事實可信性也甚受影響。

行為政治學的興起，並成為一股勢力，雖然是一九五〇年代的事，但遠在一九二〇——三〇年代一些政治學者如 Harold F. Gosnell (*Non-Voting*, 1924), Stuart A. Rice (*Farmers and Workers in American Politics*, 1924), Elmer E. Schattschneider (*Politics, Pressure, and the Tariff*, 1935) 已擺脫傳統的研究法，採用類似日後行為派學者的方法，當代行為派政治學的鉅子 Harold D. Lasswell 的最早著作諸如 *Politics and Pathology* 及 *Politics: Who, What, When and How* 都是一九三〇年代問世的。假如要追溯學術影響，則社會科學家對行為政治學的影響更可追溯至本世紀初葉的若干學者，諸如 Max Weber, Emil Durkheim, Robert Michels, Vilfredo Pareto, Karl Marx 等人。

行爲政治學分析的單元爲個人或較小的集團（以別於傳統政治學以國家或政府爲分析單元），其主要題材爲其政治態度與行爲。行爲政治學者假設一切人類的政治態度與行爲，具有基本上的共同性與規律性；發掘並證實關於這些共同性與規律性的通則，爲了解政治現象的不二法門；而只有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秉持自然科學家的態度與精神，政治學者才能達此目標；也唯有如此，政治學才有望變成一門「科學」。

一九六〇年代初葉，可說是行爲政治學的全盛時期。在美國，各著名大學的政治系中，行爲主義者顯然已掌握優勢，傳統派的學者已在退讓之中；在歐洲國家，行爲主義者始終是少數，但也形成一股勢力；在若干亞洲國家，諸如我國，少數曾負笈海外的年輕學者成爲行爲主義的主力。雖然，其力量甚爲微弱，但在若干大學的校園裏，也可聽到行爲派政治學的聲音。一九六〇年代末葉，行爲派政治學遭受猛烈的抨擊。攻擊者的主要理由，是行爲政治學過份強調摒除研究者個人價值，其結果是使政治學成爲一門「象牙塔」中的學問，對人間疾苦與病態無動於衷；名義上它是超然於現實的政治之爭的科學，實際上發生守護現制的作用。行爲派的政治學者，藉口客觀的研究，可規避其知識份子推動社會改進的責任，安享其中產階級的優裕生活，在大企業的資助下，做些無關痛癢的「計量」研究。一九六〇年代末葉，許多國家如美國與英國的經濟與社會呈現危機。其政治體系既不能提供有效的領導，也無法產生良好而公正的政策，來應付這些難題，難怪許多年青學者均不再接受行爲政治學者的一項信條：即政治學者不應汲汲乎其學問作爲實用的工具。

六〇年代末葉的危機，使許多學者對公共政策的探討發生強烈的興趣，大家感到未來的世界，許多重大難題（如人口膨脹、污染問題，都市情勢的惡化……等）只有藉良好的公共政策才能解決。現在，公共政策的研究，已漸漸受人注意。

目前，政治學界是一種多元的情勢：傳統派、行爲派……和平共存，大家都在作研究，學界出版

的書籍也是形形色色，所在都有；早期互相攻訐的風氣已不再盛行，大家雖然互相不滿，但對別派的成就也不再一筆抹殺。

貳：我國政治學的教學

我國現在擁有政治學系的大學計有臺大、政大、東吳、文化學院、東海諸校，此外，中興設有公共行政系與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淡江設有公行系。臺大與政大都設有政治研究所，授予碩士與博士學位。

我國各校政治系的課程，反映這門學科多元的情勢，但傳統派的優勢則甚明顯。筆者認為大學部課程的問題還不算多，也不算太嚴重。在教學方面，較嚴重的問題計有：①許多課程僅重視講授，學生閱讀不夠，也缺乏撰寫學期論文的練習。這個缺點的造成，主要是由於圖書與期刊的不足；此缺點的不良後果之一，是學生普遍缺乏獨立研究的興趣與訓練，這對學術人才的培養，頗為不利。②研究所的訓練，仍舊不夠強調研究能力與方法的培養，與對文獻與資料的熟悉。換句話說，太側重實質的知識的灌輸，因而頗似大學部教育的延長；若干程度較佳的研究生都感到學習的挑戰性不夠，因而缺乏興趣，這是亟待糾正的。

此外，筆者以為我國政治學教育欲圖改進，必須產生一批够份量的中文參考書，最好是專題性的叢書（例如關於政黨的，利益集團的，選舉行為的……），有系統地編纂，嚴謹地撰寫，並且都附有精選的進一步研讀的書目。

教學的工作與學術界的實際研究是分不開的；我國政治學教學的不够理想，與政治學研究的缺乏成果，實在具有密切的關聯性。我們如欲加強政治學的研究，必須對較新的研究方法與技術，採取更容忍的態度；對研究者給予協助（不僅是經費而已）與鼓勵；尤其應該勸使研究生去從事運用新方法的研究。（學生選擇論文題目時，教師似應鼓勵他做方法上較具原創性的工作。）